

# 语言暴力的语用理据诠释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摘要]** 一直以来,语言暴力现象广为语言学界所关注,但来自语言系统内部的语用理据一直悬而未决。通过分析语言暴力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称关系,文章发现:语言暴力的语用理据在于其指称距离具有明显的变异倾向,在词汇层面表现为指称距离紧缩,在句法层面表现为指称距离延长。这种指称距离变异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过度调整,导致语言表现出“意义内爆”倾向。语言暴力的语用理据分析还表明:能指不但承载着所指,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反所指能力。

**[关键词]** 语言暴力;指称距离;语用诠释

**[中图分类号]** H 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3)03-0095-06

## 一、引言

“语言暴力”是指用不合逻辑的语言手段,以一种语言霸权的形式出现(Chase 1938),孤立和剥夺他人的某种权利,最终造成对人的伤害(刁晏斌 2007)。此处语言手段不合逻辑,是指语言使用违反了语言交际的原则,即“条件原则、诚意原则、文化原则、平和原则、准确原则”(李妍 2009)。当下学界比较关注从社会语言学、社会哲学或批评语言学(李妍 2009)等角度研究语言暴力现象,并将语言暴力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前者的破坏性十分明显,诸如“咒骂”(李妍 2009);后者的伤害性则比较隐晦,往往需要语言使用者付出较多的语用努力才能感知语言的破坏力(刁晏斌 2008)。以往研究关注的语言暴力或暴力语言研究大多将暴力的受害对象界定为“语言人”,却忽略了语言暴力受害对象还可能是语言系统本身。语言暴力现象对于语言系统本身的破坏同样值得学界赋予充分的学术关注,具体原因有二。第一,当下语言文字使用领域倡导语言使用的经济化与产业化,但二者均以语言和谐为基本前提,语言暴力的语言本体分析可以为此提供参考。如果我们只是关注语言暴力对语言

人的冲击,那至多只是抓住了语言和谐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掩藏在语言暴力同语言系统本身的嵌入型关系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剖析语言暴力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刻画语言系统平衡态的必经之路,进而可以为语言使用的经济化和产业化提供学理支撑。

第二,作为一种语言结构,语言暴力不但可以反映语言对于社会的建构功能,而且可以反映语言对于语言系统本身的建构功能。诚如王德春先生所言,“人和语言结构都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交际和思维过程中建立的,通过使用逐步形成的;形成之后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建构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王德春 2003:49)。不可否认,语言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语言暴力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最典型的的就是文革话语中的语言暴力。但是,语言同时具备自身的系统性,那么这种社会现实对于语言的影响势必对于语言系统本身造成一定的冲击,并且在语言结构层面有所体现。如果说以“语言人”为受害对象的语言暴力出现的原因在于个人素质的欠缺,那么以“语言系统”为受害对象的语言暴力出现的原因则复杂得多。有鉴于此,本文将语言暴力进一步界定

**[收稿日期]** 2013-03-20

**[基金项目]**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2YJC740077)和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城市化进程中语言变异的语用生态批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引进人才项目资助(HEUCFR1131)。

**[作者简介]** 毛延生(1980-),男,黑龙江大庆人,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语用学。

为“用不合逻辑的语言手段,以一种语言霸权的形式造成语言系统内部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关系失衡”。基于以上几点,本文关注的是从语言系统本身来看,语言暴力背后的语用理据是什么?文章通过分析语言符号构成的二元要素——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称距离,尝试回答这一问题,进而框定语言暴力现象背后的语用理据。

## 二、从能指到所指:

### 指称距离的张力描述

语言暴力对于语言系统的逆向冲击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弹性变化。换言之,从语言系统来看,语言暴力的出现在本质上源于语言暴力结构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改变。依据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索绪尔的观点,作为符号的语言是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其中,所谓的能指是语言符号的文字或声音成分,而所指则是被表示的成分或概念本身。与传统语义研究中“命名派”的观点不同,索绪尔(1996)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关于后两者,他进一步指出:它们不是什么另外的东西,而正是语言符号内部的两个要素。换言之,语言符号是所指(概念)和能指(音响形象)的结合。就能指与所指的共性而言,索绪尔认为二者均具备心理属性。所指的心理学属性不难理解,为了证明能指的心理属性,索氏特别指出,能指“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由此可见,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统一体是以联想性为前提,但是声音与概念之间的“联想”关系却不是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联想,而是凝聚着语言学的认识论意义和社会制度本性的联想关系。

前者体现于声音对观念的代表并非基于其间的象征性或先天的可论证性之上;后者则体现于符号是任意的,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当中。换言之,声音与概念之间的联想关系是以“社会心理(mind in society)”为前提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符号一方面表现出对于语言使用社会规约性的尊重,语言符号表现出稳定性;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超符号层面的心理现实形态,语言符号允许一定程度的动态性。据此可知,语言符号即不完全属于心理认知体系,也不完全属于社会规约,而是

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物质形态,即维特果夫斯基所说的“社会心理”。我们的观点是:语言符号的这重心理属性是其允准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发生变异的基本前提,否则语言使用将变得僵化而缺少灵活性。例如,在现实语言使用中,语言人往往可以利用语言来表达自己与交际对象或话语指称世界之间的指称距离,即指称距离。并且由于语言符号的上述特点,语言符号的指称距离变异往往因“词”而异,各种词语的指称距离原本就不一样,具体如下例1所示:

例1

- (a)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 (b) 我最爱吃的是西瓜。
- (c) 谁见过龙是啥样?
- (d) 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

例1a是一个特指的专有名词,其指称距离往往最近;指称距离稍远的是类别名称(如例1b);而一些现实不存在的物名,其指称距离往往落空(如例1c);更有一类词的语义通顺,言通意顺,却完全找不到指称对象(例1d):这不是说这些词语没有意义,而是说它的意义往往是内涵义,即皮尔斯符号学说的“解释项”(陆正兰 2012)。由此可见,不同词语的指称距离往往存在远近之异。上述分析也恰好说明了语言符号的指称距离允准一定程度的可变性和不稳定性。我们认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索绪尔所说的“符号的音义联想属性”。确切地说,上述诸例中的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统一体把意指活动抽象于符号之中,从而把思想与事物、自然与精神的外部对立紧缩为符号的内部对立,因而“言语”活动和“思想”活动之间的动态距离自然在“语言”所指维度上有所表征。本文所讨论的语言暴力结构之所以出现,同样是出于符号的这种特殊的音义联想属性。

## 三、从平衡到失衡:

### 指称距离的变异分析

实际上,语言暴力现象的产生就与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变化有关。正是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称距离的灵活变化为语言暴力的产生提供了契入的语言系统条件。研究如何运用语言手段来表达指称距离一直是语用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Procheptsov 1998)。鉴于能指和所指的心理属性,因此指称距离是一种体现在语言认知上的抽象距离。由于语言暴力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平衡态隐含一定的破坏性,因此它往往表现

出能指和所指对象之间“貌合神离”，进而产生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称断裂。当语言暴力在一定语境中出现后，就能显现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称趋异倾向，此时原来能指所具有的针对所指对象的唯一性脱落，相反表现出对于非所指对象的包容，进而形成语言系统内部平衡态的破坏，信息熵值变高，语言表达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这不但十分恰当地证明了洪堡特所说的“语言可以兼顾稳定性和变异性”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语言本质的描述与发掘不仅仅要关注语言的稳定性特征，其变异性同样不容忽视，而语言暴力现象就是属于将语言变异性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例子。诚如 Lass (2007:15)所言：“人不是语言的建造者，而是语言的使用者，人使用的是语言系统在历史中演化的结果。因此，不强调个体或者是群体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充满变体的集合在时间中的运动。”语言暴力现象可以说是对于 Lass 评价的完美诠释。我们认为：导致语言暴力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动态变异，具体又进一步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指称距离紧缩——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第二，指称距离延长——多个能指对应一个所指。第一方面主要体现在词汇维度，而第二方面则主要体现在句法维度。

### (一)语言暴力与指称距离紧缩

正如 Baudrillard 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能指越来越多，而所指越来越少的时代，这可以看作是语言暴力最直接的表现。现如今，在报纸、电视、网络媒介中随处可见语言暴力现象对于语言系统的伤害——语言的不确定性不但没有受到压制，反而变成一种带有商品价值的语言策略而大行其道。尽管花样百出的能指形式不断，但是仍旧不能摆脱所指意义的模糊，似乎语言结构反而对语言人在实施一种“麻醉力”。例如：

例 2

(a) 芯满意足(某气门芯名)

(b) 端午传情，尽情放粽，屈原很忙(某商场粽子促销广告)

(c) 你知道亲嘴儿的味道吗？(口香糖广告)

例 2 中各个例子的能指与所指(推销的产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指称距离变异。具体来说，例 2a 中的“芯”实际上套用了汉语成语“心满意足”中的“心”，其认知解读在激活原型的同时，会让语言使用者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就是说，这里原来的一元认知变成了现在的二元认知——能指“芯”不但指

称气门芯，同时还指称“心”，建构了这种气门芯具备让人“心满意足”的满意属性。这里不难看出，从“芯”到“心”与“心”，其指称距离明显紧缩——能指表现出泛化倾向。虽然与例 2a 不同，例 2b 中发生能指与所指之间距离变异的对象是名词“粽”和动词“纵”，但是二者之间的性质一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距离延长。从语用效果的角度讲，上述广告语正是借助指称距离紧缩之后能指的双重性来实现预期的交际目的。从语言适应论的角度来说，这也是语言使用者蓄意压缩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表达特殊交际效果的重要语言手段或策略之一。更进一步讲，在语言暴力结构的使用过程中，使用者实际上是在冲突当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语言途径的过程。此时，说话者即表达欲望者。反映欲望的象征标记(如例 2a 中的“芯”)可能会压倒其它标记(如例 2a 中的“心”)而超出，从而揭示言语的藏而不露的一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暴力体现了语言符号系统的开放性——语言暴力结构与其使用环境之间保持着积极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具体表现为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开放性。此时，语言暴力结构不再是一种封闭结构，其基本要素与相互关系的解读不再保持平衡态，而是进入非平衡态，因而转变为一种开放结构——语言暴力结构不再是一种固定结构，它随着自身同语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断从语境中获取解读的条件，不断调整、改变、并壮大自身的结构。上述诸例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紧缩性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紧缩却破坏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严格的、必然的相关性。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所指背后的意义的确定性，或者说这种指称距离的压缩使得既定所指的指称意义发生了增生，进而变得中立——以前只能有一种解读，现在可以允准不止一种解读(例 2a 中，从“芯”到“心”的双向解读轨迹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确定性可以概括为质的确定性和量的确定性两个方面。鉴于前者是事物最重要的规定性，是该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根本特点和因素；后者是质的确定性在形式、数量上的具体表现(韩民青 2007:149)，语言暴力现象中指称距离的压缩破坏了具体语言符号的“双重确定性”，因此可以说是导致了语言结构意义的流失与脱落，这就会进一步导致能指背后的所指意义加速脱落，最终失去原来的指称意义。例如：

### 例 3

- (a) 你太有才了!
- (b) 那是为什么呢?
- (c) 没病走两步!

例 3 给出的是近几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台词儿转变而来的流行语。它们在套路上没有任何变化,要么是对名言的改编,要么是纯粹为了合辙押韵的“俏皮嗑”。虽然各自的能指没变,但是却表现出灵活多样的所指特征。仅以例 3a 中的“你太有才了!”为例,作为一个单一能指,其所指范围可以涵盖如下领域:

### 例 4

(a) 中国武侠版江南 style, 太有才了!(舞蹈娱乐)

(b) 期末考试迟到了,被班主任询问原因,迟到的人都说堵车之类的。结果一男生说他早上准备出门的时候,被他妈拦下来“吉”时没到,于是他迟到了。哥们,你太有才了。(撒谎)

(c) 太有才了,令人喷饭的高同步模仿秀!(模仿)

(d) 太有才了,骂人也疯狂:你从小缺钙,长大缺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左脸欠抽,右脸欠踹。驴见驴踢,猪见猪踩。(骂人)

正如图 4 所示,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无条件压缩势必导致单一能指的滥用。从语言消费的角度来看,一旦受众对该类能指产生审美疲劳,但却不能避免其使用时,这种能指的泛滥已然形成了对于语言系统侵袭的语言暴力。如上例 4 所示,指称距离的压缩被认为创造了新奇的交流方式,即产生了所指意义的增生。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延长的过程表明,与其说能指创造了交流,不如说它在交流的分段进行中消解了自身。与其说能指激活了新的意义,不如说能指在意义产生的过程中消耗了自己。因此,从批评语用学的角度讲,因为指称距离的压缩而产生的语言暴力现象不但拆散了意义,而且也会威胁社会的交流基础,导致言语交际慢慢进入不可理解的混乱状态当中。这不但应验了海德格尔的推断——人只是由于他应合于语言才说,语言之说在所说中为我们而说,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当下学界对于语言暴力深表担忧的主要原因。毕竟,语言本身仍然是典型的语义体系,它的功能就是指示,并且只有通过指示而存在(Morris 1938)。

### (二)语言暴力与指称距离延长

需要注意的是,暴力语言的构成方式除了能指

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压缩之外,还涉及指称距离延长。可以说,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变异范围可以更大,可以涉及到句法维度。具体来说,如果说导致语言暴力的指称距离压缩主要出现在词汇层面的话,那么指称距离延长则主要涉及的是句法维度之内。例如:

### 例 5

(a) 爱你五千年无望! 爱你一千年,荒唐! 爱你一百年太长! 接连爱你 70 年,只要身体健康,就是我的强项!

(b) 一斤花生二斤枣,好运经常跟你跑;三斤苹果四斤梨,吉祥和你不分离;五斤橘子六斤桃,年年招财又进宝;七斤葡萄八斤橙,愿你心想事成;九斤芒果十斤瓜,愿你新年乐开花!

如果说词汇维度指称距离紧缩大多表现为指称距离系数变小的话,那么暴力语言中句法维度指称距离的延长则往往更大一些。例如,上面例 5a 实际上表达的意思可以概括为“爱你不变”,但是其能指却绝对不是 1 个,而是 4 个——“爱你五千年无望”、“爱你一千年,荒唐”、“爱你一百年太长”和“接连爱你 70 年,只要身体健康,就是我的强项”。换言之,通过 4 个能指来指称一个所指;而例 5b 中为了表达所指“新年快乐”,则调用了 5 个能指,这些显然都比前几个例子中的指称距离还要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指称距离的延长导致一些无关能指自身所指意义的消失。例如,上面例 5b 中诸多坚果、水果(花生、枣、苹果、梨、橘子、桃、葡萄、橙、芒果和瓜)的指称意义基本可以忽略,因为它们仅仅起到合辙押韵的作用而已。

由此可见,语言单位长期使用的过程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指称距离可能发生变化,由此形成语言符号的非对称性特征:一方面,能指总是趋向于获得新义,而所指则趋向于获得新的表达手段(孙寰 2011:119)。实际上,这也反应了语言的发展和该语言所属的社会必须以种种方式相互适应,从完成表达方式的确定和分类也可以看出两者相互适应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暴力现象所涉及的指称距离延长简奥斯丁的“言语行为”三重性颇为相似。二者的区别在于奥斯丁的观点——某个人类社会的习惯可能相当大地影响着完成言语行为动词的推导问题,甚至有时候处于一些与内容不相关的原因而得不出相应的言语行为动词——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使用的基本机制,有助于交际意图的准确解读,但语言暴力当中能指一所指之间的“双向变异”则与之相反,让交际愈加复杂,

并且变得不可预知。因此,语言暴力现象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语用元素在句法维度渗透的一种表现,这也是对于欧洲大陆语用学思想(如 Verschueren (1999)语言适应论)的重要佐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语言结构的语用价值判断要以具体交际需要为判定参照,这也是语用学这一学科的基本初衷。当然,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延长还可以无限地扩大,甚至渗透于语篇维度。例如,下例 6 所表达的所指十分简单,就是“安心度日”,但是却动用了大量简单的所指,进而形成更为明显的能指过剩狂欢化语言暴力现象:

#### 例 6

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变,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年是 2001 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笑容,在今年,是否能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笑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秘着,发出巨婴的题库,我这个平凡妈妈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但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端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边的看麦娘草,只有这些,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小说《看麦娘》)

上例 6 的指称距离延长的分析表明,该类语言暴力结构的内在理据符合“能指即意义”的语用程式,即便扩大到语篇阶段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意义的所有能容将被能指所控制,只要有能指,就可以满足交流的需要,无论是怎样的内容。此时,能指与所指之间准确匹配被完全破坏,因此指称距离也就相应延长。依据篇章语言学的观点(钱敏汝 2001:234),虽然意图性、互动性和社会性这三个特性构成了篇章生产的主要方面,也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但篇章生产过程的描述充分性并未得以有效保证。换言之,篇章建构需要对预定目标做出明确的设想,要求制定符合相应目标和条件的语用程式及其实施的具体语步,所以篇章建构计划也可以理解为预先在大脑中目的和总体程式做出的构思,

而这一切最终都必须通过语言表达语义实现,同时也会在篇章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示出来。本例中,“安心度日”的表达意图具体就表现为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延长。

但是我们必须反思,从根本上讲,是所指背后的意义给交际带来了可信性,是意义赋予了能指作为交流的中介物的这一独一无二的地位。没有意义,能指很快就会在我们的交际体系中陷入不确定性的泥团。更为严重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距离的过度延长不仅仅意味着意义的终结,最终也意味着能指的终结。当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再存在确定性关系时,那个能指就到了被淘汰的时候,否则就是对于语言社会性的背叛。能指的过度使用是对于索绪尔符号思想的反动。在所指/能指之间关系的图示之中,索绪尔把所指放在能指之上,显然并非一个随意行为(索绪尔 1996)。通过这种放置,索氏强调了所指或概念地位的重要性,其重要性主要表现为观念或概念总是先存在的,声音是对概念的默写(禾木 2005)。关于这一点,从他关于“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在语言暴力现象中,能指却“喧宾夺主”,其使用价值超过了所指意义。因此,从这一个个意义上讲,能指不但承载着所指,而且还承载着反所指。

#### 四、结语

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和人类传达思想的载体,是人们理解社会、传递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即使将语言记录为文字,也只能使它不完善地、木乃伊式地保存下来,而这种文字作品以后仍需要人们重新具体化为生动的言语。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Energiea)”(洪堡特 2002:56)。语言暴力就是这样一种体现了语言动态性与变异性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因此,赋予语言暴力现象充分的语言本体关怀并适当展开语用批评对于新时期语言生态监控意义重大。通过分析语言符号的二元指称结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称距离,我们发现:从语言系统的内部来看,语言暴力现象出来的语用理据在于其指称距离的变异性,它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一种目的性调整,因此在语言上表现出“负熵性”倾向,这可以看作是语言暴力出现的主要动因。正如俄国语言学家卡尔采夫斯基所说:“能指与所指虽然成对匹配,却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正是由于

符号结构的这种不对称的二元性质,语言系统才能够发展演化。”语言暴力现象背后的理据因素十分复杂,本文的分析视角仅仅局限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难免存在偏颇之嫌。不过,语言暴力的确表现出明显的指称距离变异倾向,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语言研究者继续予以追问的课题。

### [参 考 文 献]

- [1] Chase, S. 1938. The Tyranny of Words [M]. New York: Hu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2] Lass, R. Historical Linguistic and Language Chan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Morris, C.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 [4] Procheptsov, G. G. Proxemics [M]// In J. L. Mey & R. E. Asher (ed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 Elsevier, 1998.
- [5] Verschueren, J. 1999.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Arnold.

- [6] 刁晏斌. 略论“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 [J]. 江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 82-86.
- [7] 韩民青. 当代哲学人类学[M](第一卷). 桂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8] 禾木. 从所指/能指到能指/所指——论拉康对索绪尔二元论的批判[J]. 哲学研究, 2005, (2): 95-101.
- [9] 李妍. 论语言暴力[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 2009.
- [10] 陆正云. 论体裁指称距离——以歌词为例[J]. 文学评论, 2012, (2): 133-138.
- [11] 钱敏汝. 篇章语用学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12] 孙寰. 术语的功能与术语在使用中的变异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13]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4] 王德春. 多角度研究语言[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闫卫平)

## On Pragmatic Explanation of Language Violence

MAO Yan-she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Abstract:** Language violence (LV for short) always has been focused on in linguistics but its pragmatic reasons from internal language system have been up in the ai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ference relationship in LV.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ragmatic reasons of using LV lies in its obvious variation tendency in reference distance, which is expressed as reference distance contraction in lexical level and expressed as reference extending in syntax level. This distance variation reflects the excessive adjustment betwee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for language user, leading “meaning implosion” tendency. It also reflects signifier not only bears the signified but also has the anti-signified ability.

**Key words:** Language Violence; Reference Distance; Pragmatic Explanation

